

馬肇選 謹述

一個小故事

經過一甲子才獲得剖白與解釋的

首先，必須向
全體校友特別是
在台校友致
最歉疚、最虔誠的敬禮，
五十多年，未曾參與
任何活動，其緣故，
請耐心檢視我的告白。

我的一段微末的過去，很僥倖，也很艱苦，這需要從中學說起。國立十三中成立，我已初中畢業，轉考到這所公費學校以減輕家裡的負擔。但一年後不多久，卻因為我在圖書館拏了一本書回宿舍，訓導處要處罰我，我抗拒這個處罰，很倔強的休學回家，當時，我很感謝蔣進三老師，他老人家特地找到我，安慰我又鼓勵我，他老人家曾兩次給我一百分化學滿分成績，叮囑我要立志專心壹意念化學，他是我這一生第一個要深深感激的師長，可惜我自慚「化學細胞」不夠，辜負了他老人家一片期望。從他老人家那裏我學習到要如何保護一株幼苗，不要讓它失去「成長」的可能。

另一位是教務主任尹樹松老師，他也找到我告誡了很多話，因為他老人家欣賞我的數學成績，總是交頭卷，而且滿分。當時的訓導主任是彭以齊先生，他外號彭打鐵，但心地很慈悲，在我辦完休學手續後，才出佈告，他最讓我感懷的，是他問尹老師要怎樣處罰一個這樣剛烈的學生，這種教育家的胸懷，雖然事隔一甲子的長久時段，我仍非常懷念他。尹老師，讓我想起先君：「我們的腳趾頭可以斷，但腳跟卻不可或損，否則站不穩」，尹老師讓我堅持了「決不屈服」，但不能作頑強的對抗！彭

先生，讓我了解懲罰與寬容，應有分際。當我後來拏起粉筆的時候，很起了不少的警惕作用。

這件事，發生在高二上學期，因此我的中學教育，就此中斷，最「多」祇有四年半不到。但求知慾剛萌芽，怎麼辦？幸好商務印書館吉安分館招考服務生，我抱著一試的心理，湊巧王經理和我很投緣，讓我進入了夢寐以求的新境地。

隔了一年半，學校因聯考招生冷門系報到人數稍感不足，在杏嶺又「單獨的」舉行了第二次招生，我鼓起勇氣試試看，非常感謝胡任波兄，當時他在教務處工作，尙未就讀行政專修科，他替我填了證件後補四個字，讓我報上了名。記得當時的國文題目是「攻戰之本在乎壹民說」，我依總動員的立意，分別從精神動員與物質動員發揮了題旨，僥倖的被錄取在文史系五名中的前一名。（冷揮羽兄、劉希向兄應該記得這件事，當時泰和的民國日報與贛州的正氣日報都刊出了學校的正式公告，這次考試，在九百多名報考者中，全校共取錄的好像不超過二十名。）

夢，既然有一個新眉目，迫使我立即去找十三中陳際唐校長，請他發一張高二肄業期滿

的證明書，可惜未能如願。（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陳先生說『蓋不到部印』，這句話與肄業證明書有什麼關係？我更不敢想像這句話的暗示，這是不想參加十三中校友會的根本原因，當然我最必須借此機會向「同情我的」該校學長們致最愧疚的歉意。方增兄應該不會知道並了解這個過程，那個時候，陳先生可能「已」很少回泰和。五十年來，我非常懷念方增兄與陳伯母，泰和一別，轉瞬就一甲子了！）我祇好自己跑到贛州龍嶺去碰運氣，恰巧碰到了「規矩的」羅容梓先生，很不幸的，是這件事被教三民主義的張太風先生知道，因為我在他辦的雜誌投過稿，他很熱情的「仗義執言」，讓羅主任誤會了一個十八、九歲的青年是國民黨的特工，這下慘了，「絕不通融」，最後承訓導分處周主任（通訊錄未列出他的名諱與職稱，名諱是否雍能？真是罪過）協調，特准我辦理了保留學籍，暫時離開龍嶺。我真感謝羅先生，提醒我，讓我一直想起「人貴自立」，原來他誤會了我，以為我去「先」找張先生，等我知道林彪先生係因人貴自立四個字而憤離南京的緣故，我對這「四個字」更是小心翼翼。前幾天（2002.4.26）拜讀到快六十年不見的陳縉兄對羅先生的描敘，我心中平穩了很

多，等聽到大爲兄告訴我，羅先生後來在重慶被「打」成右派，我心裏更興起了同情的大漩渦，一甲子了，往事如煙，使我更體會出「好有好的壞處，壞有壞的好處」！我們實在要很冷靜的來處理這個好與壞，很增加了我一點勇氣來寫這個小故事。

這時正逢先君棄養，戰時的逃難生活又不易維持，爲了減輕家裏以及家兄的負擔，我考進了江西省政府講習院的會計訓練班（該院負責人是張含清先生。教務主任計政先生也在杏嶺兼過課，好像校友通訊錄把他的名諱弄錯了，待考）三個月後，進入省會計處，在陳玉祥先生屬下工作（陳先生也在杏嶺兼過課）。

在贛州時，我常去龍嶺、虎崗，有時會邀約洪世昌兄、薛蕃宇兄、艾潤身兄他們一二十位同學到新贛南電影院看電影，洪伯父習醫，江蘇如皋籍，洪伯母，道地的贛州人，不知什麼原因，他們很喜歡回教徒，因此，我常常在他們文清路的家中留宿，和洪世昌、世星昆仲「打」統舖，一如青原山。那時候，楊彥作兄、陳宗濂兄、劉序伊兄、陳正蟾兄...也偶爾會被邀約，現在，幾十個人實在記不清了。祇有一件小事，必須一敘，當時，心中既有鬱悶，常常會在電影院中對嘈雜的聲音更起反感，於是

用高八度的嗓音叫出「請肅靜」三個字，果然鴉雀無聲，連針掉在地上都可以被聽見，這種鎮攝的力量，很滿足了一種「獨夫式的快感」，這種突發式的寧靜，當年的學長中，應該有人記得，我的叛逆式的幼稚，可能有好多的機會「給」了我更多的機會，一笑。（記得在那裏看過一兩部水準相當高的黑白的俄國音樂片）。這期間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事，是蔣經國先生的平易近人，他特別會原諒年輕人的錯誤，他的俄籍夫人蔣方良女士很接受了中國文化的薰陶，記得有一次在「不夜天」的晚會上，她彩排演出京劇蘇三起解，有板有眼，戲劇的韻味十足，不輸名家（據說是由名角童秋芳女士親授，這件事我想故黃尙仁兄及其令妹應該也有印象）。我很幸運，那時候，與他們伉儷有緣識荆。

第二年，我不灰心，再到杏嶺申請「復學」，又遇到了一位恩師程（臻）擷華先生，他與步曾先生交情至深，他老人家是一中老校長（我和涂寶玉兄一樣，在一年級同時考取一中和二中，這點毛毛蟲的小事，曾驚動過他老人家），非常同情我，為我開具了一個證明，讓我入學，因為他老人家當時正授稅務專修科國文，而我又不想去龍嶺再「叩」見那位懷疑

我是國民黨特工的羅主任，大概是這個緣故，我被編入該科（杏嶺各系沒有一年級），我想，稅專學長們應該有點回憶（我無法同他們一道自由參加入學考試，連報名都報不上）。攝師警告我「不要自己作賤自己」，他老人家對我，真是永恆的「音容宛在」！他老人家門下一群（國共兩黨皆有，桂永清將軍曾告訴我，他一生最懷念的老師就是攝華先生，並說出黃維將軍更懷念他老人家，方志敏、饒漱石等，與他老人家都有點淵源，我認識二中老學長吳英荃先生，即由攝師函介），許多努力的人與故事，對我激發極深，我開始對「先有教育而後有政治」這句名訓，細入探索。

在該科，我結識了一位好朋友粵籍的曾繼安兄，他非常非常同情我，在我最需要幫助時全力支援我，令我至今感懷。但，1950年左右他想來台，我輾轉託人辦好他的「入境証」寄去香港，卻「無」消息，不知是否他改變主意，還是信未收到或是「未曾到手」？我再寫信，仍無「消息」，這是令我五十多年都感「不安」與不解的事。所以我必須很慎重、很認真的在這裏插上這段話，希望校友學長中有人能指示我以繼安的下落！我非常盼望粵籍龍頭之一的黃達昌兄有繼安消息！（順便還要加插一段

話，那時候辦入境証事很麻煩，台灣保安司令部政工處的童平山處長，限制保證人祇能保證一人，爲這件事，我還得罪了一位龔姓朋友，當時我不認識也不知道這位龔姓朋友也是校友，真是罪過！)

在杏嶺，我大部份時間多在圖書館（攝師的課，是常常趨府請訓，所以稅專的學長們很少看見我的影子），有時候到洪世昌兄他們宿舍，但很少參加他們打橋牌（他們很聰明，用郵政明信片一割兩半，做成五十二張牌面，玩得不亦樂乎以訓練腦細胞，有時候，空襲來臨，這五十二張牌就顯出了它的妙用！這時節，世昌兄已接近周蔚生老先生的『大門』，快乘龍上東床了）再兩年，獨山失守，重慶發起了青年從軍運動，其優待條款中，有學籍問題者教育部可以「不究」而一律承認，於是我報名參加。當時步曾先生已離校，由蕭蘧校長（叔玉先生）繼任，他老人家寫了一封信勉勵我，訓導長胡昌騏先生也連續寫了三封勉勵我的信（這些信，我迄猶珍存）。

當時，從軍是一件很熱門的事，各機構都爭取從軍名額，稅專參軍的同學，很自然的「又」配在江西直接稅局的名額中，有一位十三中的朋友劉子瑛兄（我當時不知道他是否土

木系的同一學長？）說他幫我拏到了這筆薪資，我必須申明，我一直「無法」與該稅局聯繫，薪資更是子虛烏有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也無法知道劉兄是怎樣幫我拏到的，我想，國民黨在大陸會垮，這也許就是冰山一角的原因，陳忠忱兄告訴我，劉兄已歸道山，而且正是土木工程系的學長，我真後悔沒有在青原山通訊上與他聯繫。在 1946 年，我透過軍事新聞社通知了江西稅務局，將該筆薪資全部移贈南昌二中，以紀念我這一生唯一的一張很珍貴的「初中」文憑（其餘的文憑，全在教育部的檔案中）。

在軍中，我沒有參加政工的意願，做了一個真正的二等兵（機電系的李浴濤兄、土木系的胡廣熙兄和我都同在六二七團，這裏有一個更小的故事，必須加插，在軍中被安排參選國民黨六全代表，由於過分自信，也許又由於態度不夠積極，結果以兩票之差被擊敗，這個教訓，對我著實「教訓」了一番。還有程懋地兄，也一道退伍，在台灣，我一直沒有機會向他請教，五十多年了，至盼見諒）。

再一年半，我參加青年軍兩項人才考試，幸獲取錄（甲項共 22 名，校友祇我一人。乙項多少名已不記得，22 名中廈門大學畢業的熊大

植兄，出自南昌世家，他的報國熱忱便非常強烈，與我志趣很相投），其及格者原定保送出國深造，後因宋子文與陳誠，加上黨部的意見不同，這種大人物玩小皮球的事，在復員的過程中，已「顯出」其將衰的跡象。我當時特地透過中央日報（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）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先生。後來原案作罷，改在國防部設立新聞訓練班（班主任鄧文儀〔雪冰〕先生兼），在該班，有機會直接受教於中央大學的孫本文（時哲）先生、蕭孝嶸（筱勇）先生、艾偉（險舟）先生、許恪士（本震）先生等多位名教授，雖然時段很短，但受教的內容，及今受益無窮。該班因第一期的緣故效果甚佳，中央大學的政治系畢業生潘祖馴、王敬周等同學也隨班受訓（他們能隨班受訓，是否因上述中央大學的先生們的關係，待考），最後我和潘、王共三人皆在新聞局第三處工作（青年軍祇我一人。當時劉焜兄也在該局第三處工作，他來台後曾出任總統府第一局局長，這情形，他應該記得很清楚，潘王兩位先後都來過台灣，近況如何，我一直惦念）。該班辦了三期，即改制歸中央訓練團接辦高級新聞訓練班，訓練所謂「高級的」政工。（當時吳英荃先生是第二處立法聯絡處處長，但我還沒有

機會向他聯繫，我是在政大畢業後，透過鄧雪冰先生回新聞局改組的政工局，才由攝師函示先見吳先生）。

在新聞局與政工局那段期間，我隱約感覺到延安方面對南京已開始注意，來台以後，更略略又聽到，現在的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先生，對當年青年軍種種很早即有了解，一如毛先生對國民黨的深入。江先生的細心，從他專程去紐約探望一樵先生即可拈知。

戰爭結束前，我僥倖考取了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三期。適逢幹校與中央政校合併，改名為國立政治大學，由顧毓琇（一樵先生）主持校政，在研究部設立政治研究班，主任為陳書農先生。在政大，經過了兩年左右的陶冶，我特別要求在大學部「補修」若干學分，以便「圖」個出身。很幸運，我有機會跟隨了叔玉先生介弟公權（迹園）先生一年，使愚笨的我，略略長進了一些政治智慧，迹園先生告訴我，叔玉先生當時在美國與蔣廷黻先生正共事，而且身體正日趨衰弱。又獲受教於芝生先生（馮友蘭師），能夠從追求簡單的原始意義，再追究意義的意義，從初步的了解再進一層了解其了解，繼續了從中學時代即存在的求知渴望。

在該研究班，能受教於衛挺生（琛甫）先

生，對知識的「會通」與後來很流行的「科際整合」這個概念，略有會通（他老人家驚動日本的「神武天皇開國考」當時尚未出版）。

這期間，我被教育部確定研究生的身份，並正式具領研究生的津貼（當時被核定的研究生，至屆滿該年度，全國累計的總數，應尚未超過六百名，曾守湯兄和我同時被承認）。非常感謝一樵先生，曾兩度撥冗對我們作專題講演，有時也會約同學個別談話，我想，他老人家對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溝通，期望我們很大，特別是感應於人類社會被夾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「矛盾」中，希望我們這些繼起者要有所認識，我因為從小喜歡數學，所以對他老人家當時提出的，西方文化源於光波，東方文化起自聲波一理論，感應最熱烈，正因為這點機緣，所以獲得多一點的請益機會，正巧步曾先生也在南京（靜生生物調查研究所已遷回北平，他老人家來南京，就住在雞鳴寺中研院的招待所），這樣，機會就更多了，借用目前流行的一句話：這兩年，實在「非常充實」！

寫到這裏，讓我不由己的想起武建倫兄，他在青原山（十三中校友通訊）上，曾不惜筆墨的寫了一小段文字，記載我當年與費海璣兄的幼稚討論，當時，我和建倫、海璣都不過十

七、八歲左右，誠不知天高地厚，但求知慾特別濃（圖書館拏書的事也許由此而起），因為青原山的學生床是「統舖」，一排排的，海璣與我之間隔了一個李鳳朝兄，說話聲音，有時不免大了一點，說來真是慚愧，但建倫兄能在五十多年之後猶記得這些細節（距現在早已超過一甲子），可見我當年的傻勁有多麼幼稚與令人無奈，寫到這裏，恨不得立刻見到建倫！當然，借用當年的幼稚語言，那時節，多少同學對他妒羨，多少老師對他誇讚，而今，也已經祇剩下一甲子的回憶了！他的天分，一如他一顆向外微露的牙齒，隱的時候少，顯的時候多。（一笑）

這兩年（1946—47）由步曾先生、一樵先生薦介與先容，在南京雞鳴寺中央研究院謁見了秉志（農山）、華羅庚（蘿根）、竺可楨（藕舫）、李四光（仲揆）、吳有訓（正之）、林可勝、曾昭掄...等好幾位著名學者，著實改變了我不少的幼稚認知的辨解。

其中最令人不安的，是剛進謁了朱自清（佩佺）先生與李登輝（騰飛）先生，不久他兩位老人家先後謝世，朱先生，大家當然曉得他，李先生，正由復旦大學校長退休，他老人家教英文，國民黨總理遺囑最早的英譯，就是

他的手筆。後來台灣也有一位李登輝，民間有一傳說，傳說蔣經國先生在被詢問繼承人的時候，用浙江腔「你等會兒」諧音李登輝的笑話，應非其實，蔣氏父子對復旦的李登輝有印象，許是這一因緣的另一潛因，當然，這一潛因，也表示了國民黨沒有（或不曾）培養人才，才會吃下若干苦果！

不久形勢逆轉，國民黨在慘勝之後敗退，1949年我跟著來台，這時候，我開始對歷史產生了新的疑問。

1950年年底前，台北新成立了一所省立地方行政專科學校，以便收留一些流亡學生及來台的部分教授。我獲得機會透過臨川吳英荃先生在那裡兼課，這時候，我警覺自己認知太差，尚待充實，譬如對「必要的惡」底解釋，便必要在讀得相當多的條件下，才能分析的較清楚，準備棄職辭教，過一點儉樸的生活，以便好好的讀點書。又透過吳英荃先生把學校預備給我的聘書改聘了九江吳仕漢先生，承他的情，每月把薪水的一半送給我，直到他繼陳宗經先生出任台北商職校長，才中止這個轉送「關係」。

在那所學校，同學中，很湊巧的我教了一個很特別的學生，他原名黃金龍，後來改名黃

信介。當時我住在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58 號大華莊公寓，黃君每隔一兩天，即會來該處探望他的科主任吳英荃先生和我，其時我們感情非常好，這種關係約莫維持了兩三年之久。黃君的妹婿賴再福君是他的同班同學，前台中一中校長陳繼統君也和他同班，恰巧同住在這棟公寓，所以政專的同學因為多數都是流亡學生，常常會聚集我那兒。他好像隱約的告訴過我，他哥哥黃金標先生在大陸，但語焉不詳，我也不會多問，那時候他弟弟黃天福先生尚在念初中，往來久了，我發現他一點特徵：野心太大，能力太低，我曾把這種「情形」，告訴吳先生，可惜吳先生不久因胰臟癌去世，未及作若干輔導的補救，而我因來往既久，所知更多，漸漸的疏遠起來，他很不同意我的「退隱」，這樣我們就更加疏遠了，雖然說不上分道自揚，卻跡近不相聞問，據說，不少的政專同學都很驚訝我和他的親近與疏遠會來得這麼「快」。吳先生謝世，我寫了一篇很長的哀悼文字（台北的「江西文獻」曾轉載），其中對這段師生緣即有一段敘述，而今，黃君自己也已去世，我就不方便多說了，不過，我必須很嚴正的自責，我對黃君的疏遠與疏忽，是我在人生途徑上一大敗筆！當然，他今天已是台

灣的「聞人」，他自己也知道，我與他分手的原因，所以他的任何傳記中，不輕易提起我，連早年的照片，都刻意挑選，這些，更引起我對他的憐惜與追悔！

這裏再舉一件小事，以說明黃君與我的關係「狀況」，他 1950 年左右向我借美金貳佰元，1960 年左右我囑咐亦政專畢業的林昌明君（他班上的聯絡人，林君曾任司法院行政法院評事，此職位職等很高，略約相當於最高法院庭長之類，林君現已退休），向他表示我的生活窘境，希望他返還這點小款，可惜，不知是林君未曾表達清楚，還是黃君要我親自向他「表示」！還是林君另有「考慮」，我全無法「推測」，然此事竟無下文，甚至連借條也不見了！當然，這又是我不想再跟他見面的原因。林君後來「祇」一味向我道歉，一再說，這是他一生最荒唐的一件事，並透過他的學長羅大隱賢弟，一再向我致歉。這事，讓我想到黃君的一些作為，他周邊的人，是多少「也」要負點責任的！

那幾年，很幸運的結識了一些朋友，像蔡煨火老先生、徐佛觀先生、牟宗三先生、黃金鰲先生等，便由吳英荃先生一再聯繫而經常有討教的機會，當時蔡先生還沒有辭去立法委